

《山月记》中的伦理选择研究

聂钰颖 孙苏平

哈尔滨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 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理论, 深度剖析了中岛敦的作品《山月记》中李徵的伦理选择。中岛敦对李徵从逐梦诗人沦落为猛虎这一异化现象的描写, 通过失意诗人不愿屈从平凡世界的故事引起了广泛读者的共鸣。不过, 致使李徵作出异化成虎这一伦理选择的原因以及作品的伦理价值等深层含义仍有待挖掘。本文从小说中李徵这一人物形象自身入手, 以伦理选择为基点, 结合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意识三个视角对《山月记》进行解读, 分析李徵异化的原因以及作品的伦理价值。

关键词: 中岛敦; 《山月记》; 文学伦理学批评; 伦理选择

DOI: 10. 64216/3080-1516. 25. 12. 073

引言

《山月记》是中岛敦的代表作, 作者以唐传奇小说《人虎传》为框架并注入自己的巧思与创意, 使这本小说在立意和内容上呈现出超越原著的特质, 更符合读者审美需求。中岛敦以凝练的笔墨塑造悲剧人物李徵, 通过小人物命运的异化, 巧妙映射出日本昭和年代知识分子的群体茫然, 使其从书中走向现实。

本篇论文撰写参考了诸多文献。目前国内学界已有学者研究李徵的异化问题, 但尚未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结合并进行深入分析。笔者认为, 首先异化问题属于伦理问题, 李徵异化的原因以及这部作品所承载的伦理价值和内涵值得探索和总结。其次,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清晰完善, 其中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困境、伦理意识、斯芬克斯因子等术语与《山月记》内容适配度较高, 以此为研究理论有一定合理性。因此, 笔者采用该研究方法展开相关研究, 以求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 丰富中岛敦及其作品的现有研究。

1 身份困惑与伦理选择

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体系里, 人的身份被定义为伦理身份, 它代表着“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 以及需要承担与该身份相对应的责任与义务。主要涵盖两方面: 与生俱来的血亲身份和后天获取的社会身份”。^{[1]263} 在文学文本中, 一般通过对人物伦理选择的描写, 从伦理维度来处理人的身份问题, 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层面确认人的身份。

李徵作出异化成虎这一伦理选择, 是源于对多重伦理身份的困惑。在家庭里, 他是人夫、人父; 在官场上,

他是官吏、同僚; 后为追求诗名而辞官还乡隐居, 立志成为诗人。

第一次在官场谋官, 他孤高自傲, 不甘心做小吏, 不久后便辞官, 这是对“官吏身份”的不认同。第二次重返官场, 他仍然难以圆滑处世, 并因曾经的同僚早已升职而感愤懑。李徵把这些高升的同僚称为“蠢材”, 可见他对自己的“同僚身份”不认同。与此同时, 李徵对“官吏身份”的不认同在第二次进入官场后, 也越发强烈。分析李徵第二次重返官场的动因: 一方面, “生活贫苦, 为保妻儿的衣食, 不得不屈节再度做地方官吏”;^{[2]43} 另一方面, “对诗文之业绝望了大半”。^{[2]43} 由此可见, 他迫于“家庭身份”为了承担生活开支重返官场, 也因对诗业绝望而不认同“诗人身份”不得不再次重返官场。李徵深受多重身份的困扰导致心理负担加重, 久而久之, 他虽在其位却难改官场污浊现状, 对诗业绝望却没有其他希望寄托, 并且日益感到难以在人间自处, 所以后来化为人虎也属有迹可循, 是身份困惑诱发他作出“异化成虎”的伦理选择。这一伦理选择使他丢失原来的伦理身份, 还发生了向另一身份的转变——人虎。

2 两难困境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以“‘伦理选择’为核心, 构建了‘伦理悖论’和‘伦理两难’统一于伦理选择的三元结构, 强调通过探析伦理悖论和伦理两难的相互关系, 以观伦理选择主体范畴与伦理之间的密切关系。”

^[3]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将“伦理悖论”定义为“同一条件下相同选择出现的两种在伦理上相互矛盾的结果”,^{[1]254} 包括推论和结论两个层面。伦理悖论与伦理选择密

切相关,前者是对后者的批判性思考。一方面,当主体在进行伦理选择的推理时,会察觉到伦理悖论的存在,进而反思自身所处伦理环境的复杂多样,理解不同价值观和原则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伦理悖论作为结论,展现了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符合伦理的选择动机有时会产生既合乎伦理又违背伦理的双重结果,这启示人类要更辩证地看待伦理本身以及伦理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在小说中伦理悖论主要体现在李微第二次重返官场的情节之中。再返官场时,李微看见曾经的同僚早已升职,便心怀愤懑和嫉妒,也更加清晰地体会到难以融入官场并难以融入同僚。又因为重返官场本就不是他真实意愿,是被生活所迫,从而导致他陷入伦理困境之中。分析当时的伦理困境可以看出伦理悖论的存在,即辞官可坚守自身的伦理观,摆脱官场对自身的束缚,但会失去对家庭责任的承担;若不辞官可实现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但仍需忍受官场对自身的精神折磨,违背自身的伦理观。官场和家庭的矛盾是不可调和且不断升级的,如前文所述伦理悖论是对如何解决两种伦理矛盾的理论假设或预判,那么李微面对当时的伦理困境,能做出的选择无非是两种:做官同时能维持生计和辞官同时不能维持生计。从理性的层面来看,选择前者为正解,那么悖论自然会消失,也不会有异化的发生。之所以悖论没有消失且推动李微陷入两难困境,并召唤他作出异化选择,是因为李微自身所持有的道德观念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德观念的存在使得伦理悖论不再只是“做”或者“不做”的两难,还有“道德两难”,进而“伦理两难”便随之显现出来。

所谓“伦理两难”不是两种独立困境的累加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伦理困境,它在统合“两难”和“道德两难”的基础上形成,“是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的,如果主体对它们分别作出道德判断,每种选择都是符合普遍道德的正确选择。但是,一旦主体从两者中作出一种选择,就会违背另一种普遍道德。”^{[1]262}李微在面对两难困境时,不能轻松地作出决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伦理选择的悖论属性,悖论的存在使他感受到压迫并促使他反思要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与此同时,李微对两难困境的认知困惑,使他一直处于要解决两难困境的高压心理斗争之中,他在挣扎之中仍需做出伦理选择。此时,三元结构发挥作用,把伦理选择介入到了这种对立、复杂、多样的情境之中,将伦理悖论和伦理两难串联起来,并

解决困境。在小说中对李微做出伦理选择的描述仅是“一天出差夜半,突然发狂奔走于暗夜,后不知所踪”^{[2]44}一句带过,其夜中惊醒发狂的行为类似于“庄生晓梦”,通过后文与袁修的偶遇,读者才知道李微真的异化成了老虎,这种模糊细节且需要另一人物佐证的巧思,从本质上体现了李微做出伦理选择的艰难,以梦幻的方式赋予了人物浪漫色彩。他作出伦理选择后从一个饱受道德折磨的人变成了无道德观念的猛虎,从遵循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转变到自然界的伦理秩序。不过,通过李微对袁修坦白自己心事的情节可以看出,即便他脱离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也并没有完全摆脱人性因素对他的影响。这种异化的伦理选择和上述分析的两种选择推理并不相同,虽然打破了固有的思维模式,但依旧会产生负面影响且影响被持续展现出来。

三元结构的存在,使读者能更加深切感受到伦理悖论和伦理两难的联系、两者共同发挥作用时伦理选择内部产生的张力以及小说人物陷入伦理困境时的感性和理性的统一、矛盾与冲突的统一。不过,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小说人物能做出完美的伦理选择,李微的伦理选择暂时摆脱了伦理困境,但仍受困扰。

3 斯芬克斯因子与伦理选择

上文对伦理选择动因的分析,从人的整体范畴出发,将小说人物置于伦理现场,为其伦理选择提供合理性阐释。但李微作出伦理选择的具体思维意识未体现,其异化选择受思维意识影响,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被称为“斯芬克斯因子”。

斯芬克斯因子是“人性因子(human factor)与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的有机统一体,人性因子是人的伦理意识,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本能,只有前者控制后者,才使人成为伦理的人”。^{[1]38}在《山月记》中有文“我惧怕自己不是美玉,因此刻意不去刻苦打磨;我又对自己会成为美玉尚存半分希望,因而也无法庸庸碌碌地与瓦砾为伍。”^{[2]48}从原文内容看,李微虽为博学俊才但却保持着怯懦的自尊心和高傲的羞耻心,两种矛盾的心理日益折磨李微,诱发他精神分裂,进一步促使他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失衡加剧,从而导致他彻底失去伦理意识,发生异化。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社会中或是文学作品中的,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而存在”。^{[1]38}这里的官场同僚是一个完整的斯芬克斯因子,李微也是一个完

整的斯芬克斯因子。官场同僚被李微看成贪官污吏，是因为他们身上的兽性因子占据主导地位，而人性因子占据从属地位，人性因子不能控制他们对权力和金钱的欲望，导致他们成为道德缺失的人。官场同僚身上存在的斯芬克斯因子不仅对他们自身有影响，而且对李微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入官场之前他体内的人性因子稳居主导地位，所以有伦理意识。在两次进出官场后，他受到官场同僚身上兽性因子的影响，对当时的处境深感厌恶和矛盾，伦理意识逐渐缺失，从而动摇了人性因子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兽性因子的作用日益增强，两种因子的不断冲突使李微陷入伦理困境，加剧他内心痛苦，这也导致他后来越发狂悖难以自抑。在李微完成异化的伦理选择后，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地位发生颠倒，李微虽有头脑清醒时刻，例如他遇到好友袁彦时，但兽性因子依然占主导地位，致使他遵循大自然的生存规则猎杀充饥。李微异化的前后充分展示了伦理意识对斯芬克斯因子的约束作用，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状态会影响人的选择，只有充分发挥伦理意识的制约作用，使斯芬克斯因子的人性因子占主导地位，才能增强人对伦理身份的认同，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李微的异化行为实际上是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否定和反抗，之所以故事会以悲剧结尾，是因为李微不明白自身以及他人，或者说是不理解存在于人类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之谜。他没有觉察到自身的兽性因子，却因他人的兽性因子导致自己薄情、封闭，从而产生了对人的厌恶和对诗的梦幻式向往，放弃做人的选择可以看作是他非理性意志作用的结果。

4 结语

《山月记》这部作品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小说以“伦理”为主题，一方面体现在“异化”这一词上，“异化”代表着一种态度，是为了逃脱伦理困境和摆脱伦理身份；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情节架构和人物刻画上，小说聚焦于人物面临的诸多伦理问题，展现了李微的身份困惑与伦理选择、两难困境与伦理选择、斯芬克斯因子失衡与伦理选择。《山月记》的伦理价值体现在对人

性矛盾的探讨以及人类个体与社会关系的剖析，其中对李微的生存状况、心理需求、伦理选择的刻画尤为突出，为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群体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提供伦理借鉴和启示。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与教诲功能”。^[1]小说作为一种社会工具，理应为读者带来伦理教诲。《山月记》中弥漫着日本传统的“物哀”之美源于知识分子个人觉醒的悲哀，当时混沌的日本社会和清醒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是一种无形的羁绊。正是这种羁绊，引发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也触动知识分子反思和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作者希望知识分子能得到关注，但又以李微的个人悲剧作反例给人以警示。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有伦理的人，不应该丢掉自己的责任与身份，退化成没有思想的兽类。

总而言之，《山月记》表达了作者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彰显了作者积极履行文学社会责任的态度，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与鲜明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 [1]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2] 中岛敦. 山月记[M]. 李默默，译. 江苏：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43-50.
- [3] 黄绮. “伦理悖论”与“伦理两难”的理论溯源与阐释[J]. 华中学术，2024，16（02）：21-29.
- [4] 聂珍钊. 伦理选择概念的两种涵义辨析[J]. 外国文学研究，2022，44（06）：15-25.
- [5] 贾耀平. 《山月记》新论——围绕唐朝科举制度和虎形象[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04）：70-73.

作者简介：聂钰颖（2001.06.15），女，汉族，吉林省吉林市，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在读，日语语言文学方向。

通信作者：孙苏平，哈尔滨理工大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点课题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GJB1423449）